

跨文化语境

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文化语境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葛桂录

著

【旗山新文丛】



上海三联书店

跨文化语境

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旗山新文丛】

葛桂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葛桂录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4

ISBN 978-7-5426-2757-5

I. 跨… II. 葛…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外国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937 号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著 者 / 葛桂录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陈志皓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26-2757-5 / I · 368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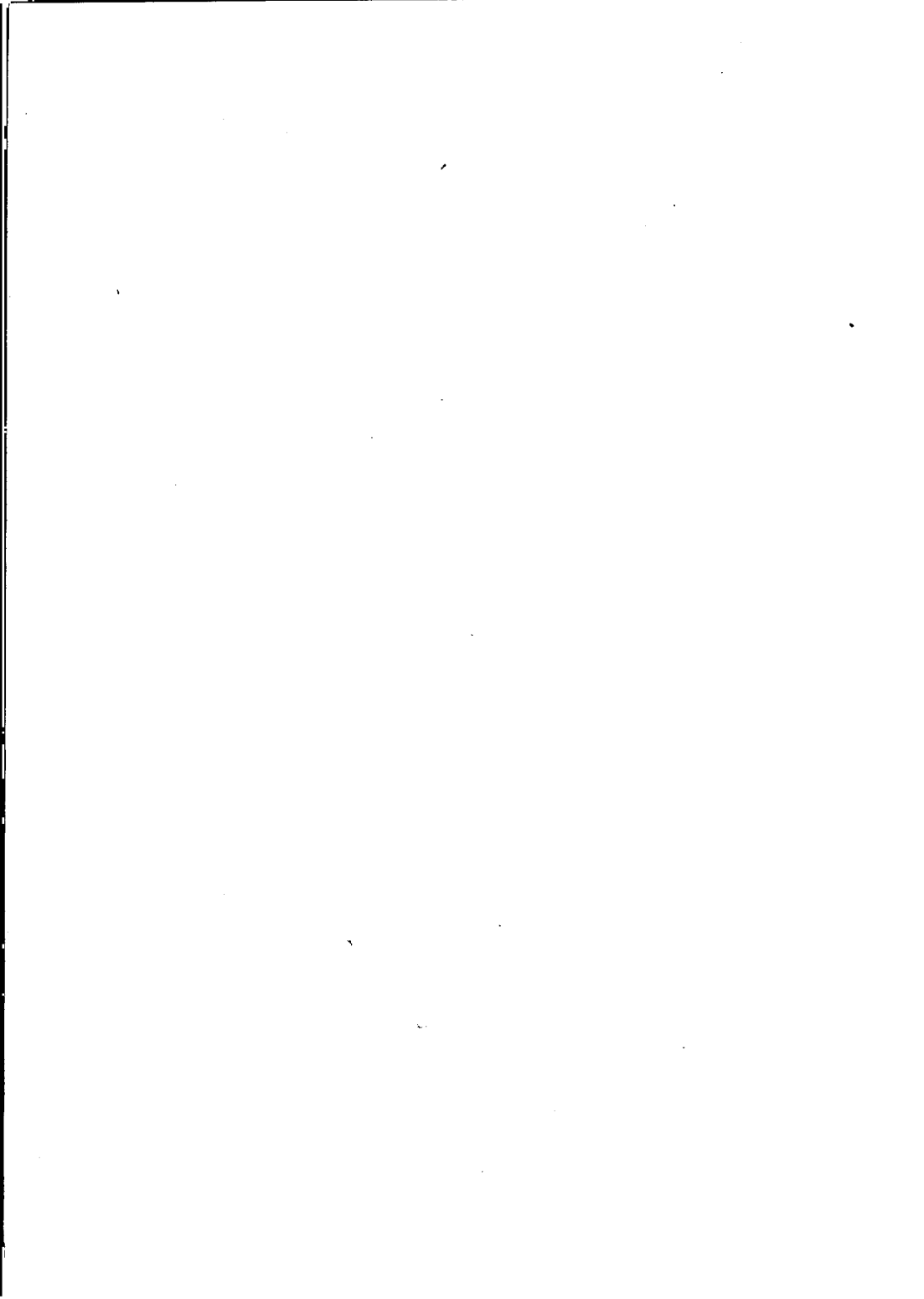
上编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践与学科建构	1
第一章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	3
第二章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属性、现状及展望	21
第三章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及阐释策略	40
第四章 Shanghai、毒品与帝国认知网络——带有防火墙 功能的西方之中国叙事	62
第五章 王国维的西方文学家传记及其美学思想之关系	97
中编 中意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141
第六章 “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罗马作家对丝人国的 浪漫遐思	143
第七章 坎坷的天堂之路:中国文学舞台上的但丁形象	157
第八章 中国英雄·中国公主:意大利作家笔下的中国 题材	238
第九章 “中国神话”的解构:维柯、巴雷蒂的另一种声音	255
下编 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271
第十章 源远流长的中英文学关系史	273
第十一章 异域文化之镜:他者想象与欲望变形 ——关于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学术对话	314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第十二章	“明确而具体的阐述” ——范存忠先生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334
第十三章	虚构游记中的东方想象 ——《曼德维尔游记》的文本考辨及阅读策略	348
第十四章	英国浪漫作家的异国情调及中国印象	375
第十五章	I. A. 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	401
附录一	文学交流史研究:文献史料、阐释立场与学术期待 ——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学术研讨会 综述	427
附录二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445
代后记	几分耕耘,一点收获 ——研究中外(中英)文学关系的十年回顾与体会	462

上 编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理论与实践与学科建构



第一章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

跨文化交流语境里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领域,也是取得最好实绩的研究领域之一。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学者以及近二十多年学界时贤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就,昭示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坚实根基。为使这一领域有可持续拓展的潜力与动力,我们觉得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一是文学关系原理与方法的研究与推广;二是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这是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两条灵动(理论)而坚实(史料)的腿,依靠它们能够在比较文学与文学交流领域走出一方宽阔的天地。本章仅就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做一点初步思考。

一、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坚实的史料基础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与学术价值。

史料从何而来?清季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①胡适之先生进一步申说:“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

^①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①在胡适看来,一切古书皆史。因而史料的搜集就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傅斯年先生甚至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②

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则强调:“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③对史料进行加工制造,也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观念或曰史识形成的过程。史料与史识相结合,在特定研究思想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史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原料(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即 primary sources)或直接史料;二是次料(次手材料,第二手材料,即 secondly sources)或间接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如何?傅斯年先生的相关论断可资为鉴:“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因而,“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傅斯年指出,对“直接材

① 《中国书的收集法》,《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② 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③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①

不论直接史料抑或间接史料,都要花费大功夫广为搜罗。因为这些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应该说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文学关系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有经验的研究者对此多有深刻体会:“一个成熟的研究课题,应有相对完整的史料积累,这往往是这个课题研究成败与否的基本条件。”^②

这方面,鲁迅先生也为我们做出了楷模。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曾招致许多非议,其中一条说他的这本著述是以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献概论讲话》“做蓝本”的。鲁迅对此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③史料文献如何去独立准备?鲁迅自己说过:“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中国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这种“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精神与意志,大概是每位严谨的治学者不得不具备的。^④

① 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5页。

②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④ 笔者在搜集中英文学关系史料的过程中,亦有深刻体会。拙著《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的后记中曾有这样的回顾:“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在南大老图书馆过刊阅览室和中文系资料室,阅读了几乎所有建国以前出版的近现代报刊和图书,摘抄了2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揭开那些尘封的纸页,享受发现的乐趣,让我忘记了严冬酷暑和饥肠辘辘,每每在校门口小吃店用碗面条填充颇受委屈的肚子,回宿舍清点一天来的‘战果’,那是最舒心的时候。”



跨文化语境中的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1933年6月18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谈及自己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的写作计划时,说“先从做长篇入手”^①。此前他论及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时,则强调这样的“文学史资料长篇,非‘史’也”,“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②。由此,鲁迅强调“史识”与“史料”的统一,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钱理群先生谈到自己著书体会时也曾这样说:“每写一部重要著作,一定从史料的独立准备入手。而且据我的体会,随着学术眼光、思路的变化,必然有一批新的史料进入研究视野;而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也得到了深化,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的互动过程。我自觉追求的研究的新意与创造活力,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新的学术眼光,以及被激活的新的史料。”^③

一般而言,在文史研究领域内,比较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由此推论,衡量一部文学关系研究论著的学术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进而引发多少新问题,展现多少“新的学术眼光”?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20世纪初以来,我们各种新学科群的建立,往往得益于极其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及新问题的提出。但新史料与传统史料也不能完全无关,正如傅斯

① 鲁迅:《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② 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8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③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89页。

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年先生所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①

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带有一定偶然性。研究者们更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部寄于新材料的发现上。这样看来，有些新资料并非刚刚挖出来的，而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于是有些最常见、最一般、最现成的资料，当你用新的观念去阅读时，它便成了新资料，能够给别人提供新的东西，即上文钱理群先生所谓“新的学术眼光”被激活的“新的史料”。因此，读常见书，挖掘常见材料里的潜在史料价值，不失为一种研究方略。^② 其实，史料之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主要看人们的需要和远见卓识。同样一件史料，放在不同的研究者手中，得出的结论和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不完全相同。

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设若文献材料有误，势必会影响整个研究基础与历史描述。严谨的治学者均将文献资料的搜罗、编年，当做第一等的大事。许多研究思路和设想就出之于那些看似零零星星的材料中。因此，提倡史料的搜集与考辨先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史料搜集及援引的真实性，乃学术研究的首要基础。这方面，史学界有所谓的“不确实之病”：英国史学家弗劳德(J. A. Froude, 1818~1894)曾游览过属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城镇爱戴雷特(Adelaide)。据他的记载：“吾所见者，平原当前，一河界之，此 15 万居民之城市，其中无一人之心中曾蓄有片刻之纷扰，但有宁静无欲，每日三餐而已。”但实际上，此小城建于山岭间的高地，无任何河流界之，人口不超过七万五千，

① 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第 33 页。

② 鲁迅先生在比较自己与郑振铎的读书治学时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鲁迅：《致台静农》（1932 年 8 月 15 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1—322 页。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而且弗劳德去那里游览的当儿,小城正困于饥馑。弗劳德是英国首位根据未刊与已刊的原始文献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在对爱戴雷特小城的描述上差错显然,难怪被斥为天性多误,即所谓“不确实之病”。此病乃因急遽求速与轻忽失慎所至。史学家杜维运引用了这一记载后,则指出“历史的壮观,实建筑于坚实的细密考证工程上。数以千万计的历史考证学家,耗珍贵岁月于此考证专业,其有功于历史,实非远逊于撰写贯通性历史大著的少数史学家”^①。

因而,文学关系史研究也离不开文献考据功夫。从现存文献材料出发,尽可能清晰地勾画文学交流的基本史实,应是中外文学关系史撰著的最基本要求。比如,经过文献史料的考辨,关注诸多处于“第一”、“首次”、“最早”地位的文学关系史实,因为它们在文学关系史上,往往会构成一个个转折点或新的坐标。笔者在撰著《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的过程中深有体会。一些新史料的挖掘可以改变现有文学交流史、译介史的论断。

史料搜集,当然不易。除了需要持之以恒,投入大量精力外,尚需有识别史料价值的能力。我们通常所见的史书报刊上的文学交流史料,有时并非完全能从正面识别出来,从它们的反面或侧面,往往可能会暗示出一种重要的交流史信息。

这种识别史料价值的方法,前辈学者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翦伯赞先生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讲得非常明白:“还有一种史料,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又有一种史料,综合起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起来,才有更大的价值。再有一种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帮助我们搜集这一类史料的是统计学。”^②所以翦老说“我们要运用各种方法,把史料从原书中钩索出来,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②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从正面看不出来的,从反面看,侧面看;从个别看不出来的,从综合看;从笼统看不出来的,从分析看;从片面看不出来的,从类比看。这样,我们便能网罗所有的史料了。”^①

关于史料与方法的关系,翦伯赞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② 所谓既要“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反之,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楸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如何搜集整理大量的史料,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研究某一个问题,如果文献史料的占有不比别人多,理解问题又不如别人高强,则必然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对问题的研究假如没有独立而详备的资料准备,就会受制于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之自己的论证不足,难免产生一些主观片面的认识,最终无法解决实质问题。

所以,要想构建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的框架脉络,尽可能大量阅读初始文献史料(包括中古、近代、现代的史料),感知文学交流场的脉动,这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步骤。

·比如,就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而言,举凡外国作品在中国翻译的初版本、译本序跋、出版广告、据作品改编的电影海报,近现代报刊刊载的重要评论文章,作家的旅行日记、信函、交游录、自传等等均在搜集汇总之列。而要想试图探讨明清时期的英国形象问题,其范围

①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② 同上,第85页。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即可包括明清年间中国对英国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采纳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充分采辑文书档案、私人笔记、日记、通信、学者著作、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游记、报纸杂志、民间传说、图像实物等相关资料。再进一步通过研究英国在中国的形象这个具体个案,尝试对国际理论界有关异国情调,形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中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等理论观点,进行验证与补充,亦即“新的史料”与“新的学术眼光”的互动关联。

2004年10月召开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阐述了文献还原与学理原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具体总结了自己整理和研究文献的经验,他总结为八事:1)版本的鉴定与对鉴定的思考;2)作家表述与历史材料互证;3)文本真伪与风格鉴赏;4)文本搜集阅读与文本外的调查;5)印刷文本、作者手稿、图书馆藏书与作家自留书版本之间的互补互勘;6)文学材料和史学材料的互证;7)现在材料和古代材料的借用、引申和旁出问题;8)图和文的互动问题。^①

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关于德语文学汉译史的考辨研究,对我们启发亦大。他的做法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索引、书目汇编,以及前贤研究成果,理清汉译德语文学的家底,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爬罗剔抉,存真定伪,整理出晚清至民国时期较完整的汉译德语文学书目,并根据年代和作家进行梳理考订”。同时,他还特别关注散见在各种杂志报刊上的单篇译作,以及各种译本的序跋,杂志报刊上的书评广告,乃至关于德语文学汉译的文坛笔战,地域文化对汉译德语文学的左右,中国政治历史之变故对德语文学在中国际遇的影响等问题,均在采辑探讨之列。同时试图通过对以上各点的绍述,检点当时译者及评家对德语文学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文学眼

^① 参见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248页。

光的见识,掌握德语文学在中国接受史的基本实况。^①

当然,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在本土作家作品里发掘与验证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撞击的史实与成果。因为文学交流(特别是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过程中的影响接受与互动认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比如但丁与中国的关系,当我们搜集到了但丁作品在中国的诸多译本、改编本、评论后,中国作家在什么层面上、如何来接受这样一个意大利作家呢?为什么鲁迅先生称他为“总不能爱”的一个作家?老舍则说“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对巴金来说,“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在盛成眼里,“但丁是我们第二至圣先师”;在现代中国诗人笔下,但丁形象又是如何?均值得我们详加考述。

史料虽成“历史”,一旦将之置于历史场景中,就会成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对此,钱理群先生说得好:“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东西,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②

二、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任何学术研究的结构,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

①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②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0页。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对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文学与文化关系基本史料的搜集、鉴辨、审查、理解和运用,就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工程。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建立在资料实证基础之上的。因此,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是其他专题性研究所无法替代的。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走在了前头。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大力借鉴这些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与成功经验,将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企求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文学关系史料编排与阐释,其目标是尽可能接近或还原中外文学交流历程之面貌,揭示文学交流的历史规律及对现实的启发意义。所以,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则成了资料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原始性是决定史料真实性的的重要因素,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决定它的史学文献价值的首要因素。所谓史料是否真实,是想确证这份材料是不是原件?这份材料从史料学上说是不是原始资料?比如说,某人写的回忆录,单就这份材料而言,当然是原件;但是回忆录是一种事后的回忆资料,详略正常,偏误难免,从展现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则很难称其为原始资料。有时,不经意的记载,或者更进一步说无意的记载,其史料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这就是说,史料的真实性(是否原件)与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历史事件)之间,关系很大。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于它们是否为原始资料或曰原典性材料,而成为我们叙述那些历史活动的最可靠的凭据。原始资料为什么值得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史料的原始性,以及反映的主体事实方面有绝对可靠性。

探讨文献史料的真实性,离不开史料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存的特点。对学术研究来讲,史料的相对性意义更加无法忽视。